



心系祖国复兴 献身水利事业 李曼卿 上

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华诞，我为祖国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欢欣鼓舞。回想自己这一辈子，作为归国华侨，能成长为国家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的专家，百感交集，深深感悟到是党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，使我不断前进。

父辈

我祖籍广东汕头潮阳，祖父在旧社会因生活贫困，离开家乡到印尼卖苦力，当码头工人，随后又把我父亲带到雅加达去当学徒、店员。由于父亲勤奋刻苦，逐渐有所积蓄，开了商店。父亲爱国爱乡，为家乡捐资办学、修路、修桥等，热心当地的公益事业，被推选为印尼雅加达潮州商会主席。1959年荣获毛主席、周总理、陈毅外长发出的请贴，邀请回国观光并参加国庆十周年天安门城楼观礼。

母校

1945年8月日本投降，在印尼雅加达的爱国侨领司徒赞、刘宏谟以及刘耀曾、李易洪等老师，在雅加达积极筹建了巴城中学（简称“巴中”），占领华侨教育阵地。

我的中学生活就是在巴中度过的。巴中是著名的爱国华侨学校，校训为“乐



李曼卿夫妇与儿子儿媳孙子合影

观、进取、合作、奉献”。学校的爱国氛围深深感染了我。其时我单纯热情，求知欲强，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的同时，也阅读革命进步书籍，探索生命的价值，追求闪光的理想。巴中奠定了我健康成长的基础。

印尼于1950年4月13日与新中国建交之前，在雅加达有国民党政权的大使馆，拉拢华侨和青年拥护蒋介石。当时，我也积极参加反蒋爱国斗争。

1965年印尼发生军人政变，杀害无数印尼共产党人。1966年印尼当局查封我母校巴中，巴城中学的老师刘耀曾、李易洪、张国基、钟士民等被迫先后回国。

回国深造

1953年我在巴中高中毕业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，投回祖国怀抱。新中国成立前我父亲原来计划让我赴荷兰留学学医，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见我决心回国，表示赞同。但当时印尼当局

刁难我们，威胁我们凡回国者必须签字发誓“今后永远不再返回印尼”，怕我们回印尼去闹革命。我毅然签字后登上“芝万宜”海轮回国，于当年考入天津大学水利系，1955年院系调整，转到武汉水利学院，决心学好本领建设祖国。

参加祖国建设

1957年大学毕业时，我向高教部申请去边疆参加水利建设，如愿以偿地分到地处边陲的黑龙江农垦部农垦水利勘测设计院，从事垦荒水利工作。

当时设计院的院长、书记都是老红军、老革命。他们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，是我学习的榜样。

开垦黑龙江北大荒的沼泽，首先要排水和修建水库，因此需要进行水利查勘和收集资料，然后才能规划、设计、施工。

当时北大荒条件十分艰苦，水利查勘全凭两条腿，在荒原上一天要走五六十里地。吃的是高粱

米、窝窝头，住的是帐篷、泥草房，而且冬天气候十分寒冷，由南洋热带摄氏零上30多度到北大荒的零下30多度，绝对温差达60多度，生活环境极大的差异，这对我来自热带印尼的归侨女青年是十分严峻的考验，但这些困难都没有压倒我，相反地我总是满腔热情、干劲十足、顽强战斗，和男同志一样“头上青天一顶，脚下沼泽一片”，淌漂筏、过洼地、迎寒风、踏冰雪、风里来、雨里去，一心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水利事业。有一次我为了查清一个水源拦河坝资料，在深厚的雪地中步行60多里，最后查清了资料，自己却晕倒在雪地上。

我在北大荒克服了重重困难，胜利地完成了水利资源的调查任务，参加编制开发三江平原的水利规划，并参加大中型水库和排灌渠系等水利工程的设计和施工。在北大荒20年的漫长岁月里，同数十万转业官兵、支边青年和广大干群一起参加垦荒水利事业，使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今日的北大仓，现在年产粮食400亿斤，成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。我在垦荒事业中先后多次被评为三八红旗手、五好干部、先进工作者，于1966年3月

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被选为佳木斯市人民代表、政协常委、黑龙江省妇女代表、省侨联代表、省政协、省人大特邀代表和佳木斯市华侨工作组组长。

我爱人徐世钧是我大学同学，我们均是团干部，大学毕业时一起向高教部申请要求参加边疆建设。他工作勤奋拼搏，被誉为“暴风雨中的雄鹰”，他在建设边疆第二年即被批准为光荣的共产党员，先后多次被评为五好干部、先进工作者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、优秀共产党员。由于我俩志同道合，感情升华，于1959年结为终身伴侣，决心为祖国水利事业奉献终生。

1976年我调到水利部治淮委员会（简称“淮委”）工作，负责淮河流域规划的水文工作，曾带领淮委水文工作组在南京大学指导地理系毕业班学生进行沂、沭、泗水系的水利设计的洪水分析计算。1978年被评为淮委先进工作者，并被选为蚌埠市妇女代表和市妇联常委。

1980年初我被调到水利部工作，在水文局赵珂经局长领导下，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（UNDP）援助的项目“发展全国水资源资料及技术转让